

# 明清山西会馆祀神的社会功能

刘婷玉

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山西商人也在这股不断迁移的人流中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汇通天下，甚至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而至今可见的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作为山西商人曾经辉煌的见证，因为其由流寓他乡的商人所建，或有人将其看做是明清之际商帮势力形成的载体，或有人将其看做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山西会馆自明朝产生开始，“笃乡谊，祀神祇，联嘉会”就成为其最主要的功能，而“笃乡谊”、“联嘉会”又是围绕着“祀神祇”这一大主题展开的。许多会馆本身就是先建神灵庙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在北京的山西颜料会馆最先为关圣、玄坛、财神、真武大帝、葛梅二仙庙宇，后来扩展为会馆。洛阳的潞泽会馆，最初为关帝庙。南京的山西会馆，先是乾隆年间把颜料坊的关帝庙作为办公地址，后将附近民房购买予以扩大，最后成为山西会馆。可以说，至少在一个会馆的建立之初，“祀神祇”是其得以建立的号召

以及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山西会馆多以主祀关帝的庙宇结构出现，或者本身就是关帝庙被山西商人加以重修扩建作为会馆之用，其碑文中也多提到在建立会馆之初是以“祀神祇”为首要目的的。如北京前门外颜料会馆的《重修庙宇碑记》中提到：“从来神所凭依之地，虽历久而不迁……于是敬卜吉期，重修大殿。设关公、玄坛、财神于左，真武大帝居中，葛、梅二仙于右。为众人所顶礼。”《重修仙翁庙碑记》中也说：“正殿为真武宫，关圣帝君、玄坛、财神列于左，梅、葛仙翁列于右。神光显赫，灵佑昭彰，锡兹祉福，吾乡在京商贾，托庇宁有穷哉！其东南前院，北殿则火帝星君神也。上应天宿，下荫民生，乡之人得安居廛市。”而晋冀布商会馆的《创建晋冀会馆碑记》中则提到：“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中厅关夫子像，左间火神、金龙大王，右间玄坛财神。”《重修晋冀会馆碑记》记载“晋冀布行会馆……至今百余年。其馆内旧有神殿三间。凡我同人，每逢节期朔望，焚香跪拜者，无不目

睹心惊。”

### 山西会馆神灵脸谱

从上文引用的诸所山西会馆碑文中，山西会馆所祭祀神灵的体系似乎可见端倪，其神灵设置与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的神灵系统有所不同，更多折射出商人在功利心理驱使下的需求。对于会馆内的神灵类型，研究者多将其分为乡土神、福禄财神和行业神三大类，但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并无绝对清晰的界限，大部分山西会馆主祀的关帝就常常承担着乡土神和福禄财神的双重身份。

一、关帝祭祀。同福建人奉林默娘为天后圣母，江南人祀准提，浙江人奉伍员、钱镠为列圣一样，山西人也将最具代表性的同乡神灵关羽奉为关圣大帝，作为全国各地山西会馆的主要乡土神，并且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关帝庙渐渐成为山西商人在各地留下的标志性建筑。

关羽（？～220年），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关羽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关羽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

二、福禄财神。财神这一意象对于千里迢迢离家求财的山西商人来说尤为重要，民间多认为财神即赵公明，又称赵公元帅、赵玄坛。山西会馆亦供奉增福财神，如山西临襄会馆的《重修临襄会馆碑》中就记载：“内供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马

王老爷诸尊神像。”《三教搜神大全》有增福相公一图，称“李相公讳诡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兼管随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饭禄料，及在世居民每分定合有衣食之禄，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赠为神君增福相公。也有世人认为财神即比干。《封神演义》有比干强谏纣王、被纣王剖心的情节，因贫者求财不可得，富者求之越聚越多，所以有人说财神是无心之比干宰相，成为山西会馆供奉的又一财神意象。

三、行业神。由于大部分山西会馆都是以工商会馆的形制兴建组织的，所以不同行业会馆亦祭祀有本行业的保护神，成为山西会馆所祀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对其中比较重要者加以叙述。

铜、铁、锡、炭业——太上老君。北京广渠门内炉神庵《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载：“老君之为炉神，于史传无考。予尝揆以意，或世传道家丹灶，可铅汞致黄白故云尔，抑亦别有据耶？吾山右之贾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太上老君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之号，因其炼丹炼汞有执掌火候之功，所以与火有关的行业包括铸造业和补锅业等纷纷把太上老君视作自己的行业神。而烧砖瓦及制陶业除了供奉太上老君外，还供奉土地爷、山神以及牛神、马神等，因为土和山是这些行业的原料来源，牛马则是采料、运输的脚力。

染织业——梅、葛二仙。北京前门外山西颜料会馆的《重修仙翁庙碑记》中记载：“正殿为真武宫，关圣帝君、玄坛、财神列于左，梅、葛仙翁列于右。”民间一般认为是梅、葛两人发明了染布之法，所以颜料会馆和染坊公所一般都供奉梅、葛二

仙。每年四月十四和九月初九这两天，颜料行业和染织业从业者要对梅、葛二仙进行祭祀，并有饮“梅葛酒”之习俗，以示行业兴旺，后继有人。

其他如晋商酿酒者尊关帝和酒仙（李白、杜康、吕祖），酿醋者则尊醋仙翁和水神，茶行供陆羽，等等。

四、其他护佑神。除了乡土神、行业神以及财神外，山西会馆往往还供奉有其他护佑神。

火神（火德真君）如《重修仙翁庙碑记》：“其东南前院，北殿则火帝星君神也。上应天宿，下荫民生，乡之人得安居廛市。”民间一般都以祝融为火神，据说他本是颛顼氏的后代，名重黎，也叫吴回，帝喾（即高辛氏）当政时，官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乃命曰“祝融”，死后为火官之神。

金龙四大王。聊城的山陕会馆以及天津的山西会馆内都有金龙四大王神像，与关帝合祀。如天津的山西会馆内碑记：“公至会馆内，恭庆关圣帝君金龙四大王神前，呈供献戏一天，以求神灵默佑，永保平安。”金龙四大王崇拜在中国民间是兴起较晚的信仰，它主要是凭借其漕运河道保护神的独特作用，在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山西会馆的“金龙四大王行略”碑，体现了山西商人对运河的依赖性。

#### 明清山西会馆祀神的社会功能

明清山西会馆的神灵祭祀，除了其所承担的部分民间宗教信仰功能外，其社会经济整合功能更显突出。

一、给流寓外地的山西人以心灵的慰

藉。

由于排外心理在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对于地方社会来说，山西商人是外来的，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他们总显得势单力薄，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漂泊无依感，那么，向法力强大且是同乡的关帝寻求护佑，以减轻心理上的弱势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应急反应了。明清时期正是关公文化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不仅享有统治者的隆重祭祀，在民间的影响力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关帝信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地山西会馆均以关帝为主祀，无疑是很巧妙地利用了关公文化在各地本身已经存在的影响力。有了关帝的护佑，无论是对于山西商人还是当地百姓来说，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山西商人作为客居者在心理层面的弱势地位，而且此时已经成为明清官方正统文化一部分的关公崇祀，无疑也为各地山西会馆的正统性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神灵祭祀成为商帮构建的文化纽带。

大多数晋商研究者都认为，山西商帮的建构，是通过山西会馆这一媒介而实现的，这一个认同的过程是各种各样的人或群体以共同的文化纽带进行自我组织，而这种自我组织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会馆的神灵祭祀基础上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派别存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同乡商人“无一区托足，则其群涣”，群涣必然削弱竞争力量。因此，无论是从联络感情出发，还是从经商需要出发，他们都需要一种在政权容忍范围之内

的组织形式来加以联结，而以乡土神祭祀为基础建立的山西会馆正是这样一种应运而生社会组织形式。对处于流动中的客籍的山西人来说，会馆神灵成为一种整合的纽带，其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人们在经营活动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疾病甚至灾祸，会馆所祀神灵可以为他们提供在某种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其次，会馆神灵是构建商业伦理道德的重要资源。会馆所奉祀神灵虽各式各样，但却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忠、信、仁、义之士或传说中的有功有德之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再次，会馆的神灵祭祀是商帮内部权威的象征和维系商帮秩序的生命线。山西会馆通常通过神道助教化，来构建“逐利思义”，“诚信无欺”、“和气生财”的商业道德和商帮精神。如社旗山陕会馆现存有“同行商贾公议戡秤规矩”碑文，刻于雍正二年（1724年），近140年后又重刻于同治元年（1862年），规定“公议秤足十六两，戡依天平为则”，不得以私戡秤更换，违者罚戏三台，如不遵从就需“禀官究治”。这种约定正是借助于神祇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祇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贾廉商的商家正气。而关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是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脊柱，因此，被民众举为正义化身的关公就成为商人会馆中至高无上的神圣帝君了。

三、会馆神灵成为带有乡族组织形式变形性质的民间“自域”组织的虚拟“共祖”。

王日根教授指出：“会馆是最能反映

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会馆已日益明确地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动性人口方面发挥了官府一直想有所为而无能为之的功能。会馆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同乡性的，以乡土神作为其组织的神灵支柱，显得具有稳定性和活力。”这实际上弥补了官方管理机构在这一界域中的薄弱之处。所以，陈宗蕃说：“夫欲国之治也，必自乡始。礼曰：‘君子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也。’吾国治乡之法，一业有一业之规约，一族有一族之规约，一乡有一乡之规约，在外之会馆，亦其一也，规约明则事无不举，规约不明则事无由行。”商人会馆对违规者多处以经济处罚。与族规相比，其野蛮性与残酷性不明显。纵然如此，行业条规在实践中起到了与族规类似的作用，成为山西商人群体构建以神灵崇拜为基础的民间自域组织的条件之一。

由上观之，明清时期山西会馆奉祀神灵，具有鲜明的社会整合功能。明清山西商人们通过在其客居地构建以乡土神祭祀为基础的地方性会馆，逐步组建形成了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全国性的大商帮，其所奉祀神灵对于流寓他乡的山西商人们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不仅为山西商人们提供了慰藉漂泊感的心灵皈依，更成为彼此联结的文化纽带，并在与官府的斡旋以及与客户居地人民的关系中担任了协调的角色，甚而因其所奉祀神灵在文化公信力方面的正统地位，逐步得以建立统治者容忍范围之内的自域组织，在山西商人以及之后逐渐成形的山西商帮对外势力的扩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